

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梁曉虹 著

南山大學學術叢書

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梁曉虹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梁曉虹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5.3

ISBN 978-7-101-10818-7

I. 日… II. 梁… III. ①佛經-訓詁-日本②日語-漢字-研究 IV. ①H131.6②H3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50815 號

-
- 書 名 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著 者 梁曉虹
叢 書 名 南山大學學術叢書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2 $\frac{3}{4}$ 插頁 2 字數 63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818-7
定 價 108.00 元
-

序

高田時雄

日本的學術伴隨佛教而開創。其發展正是因爲有寺院的存在,此乃毋須辯駁之事實。特別是文字音韻之學問因佛家而得以傳承,此與僧人閱讀理解經典的努力有著很深的關係。寺院僧人研學對象理應遍及經律論三藏全體,然不同宗派對於各自所依經典各有偏重也是理所當然之勢。因此,爲各不同經典而編纂音義,乃極其自然之事。而這在日本是很突出的現象。這些音義書摘取經典語詞爲對象,標註字音及字義之解說,然當時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字書、韻書被到處利用,其中在中國已經徹底亡佚者亦爲數不少。這些音義書在日本被當作所謂“國語學”資料而被整理研究過。因此,這些研究大多集中於古辭書定位、和訓問題、甚至是日本漢字發音史,此實乃不得已之一面。

而另一面,梁曉虹教授的這本書從中國學的立場出發,利用日本的單經音義對漢字發展變化的歷史進行了嘗試性探索。傳入日本的漢字,在繼承當時中國漢字狀貌的同時,取得了獨自的發展。爲能綜合敘述這些內容,就必須對各個資料成立的時代背景和作者有較爲深入的瞭解。著者對先行研究進行了全面且詳密的探討研究,以期無失。日本僧侶所撰音義的學術價值,在正確地被定位於作爲中國學的重要資料的同時,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得以全面被介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研究成果用漢語在中國出版,我認爲將會深受歡迎。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與開拓,對漢字字形發展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首先是由於敦煌吐魯番寫本等同時代寫本的大量發現,其次是石刻碑文整理的進展,也爲瞭解各個時代漢字的實際狀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另外,明清時期民間刻本中出現的俗字也被引起關注,尤其是房山石經的字體和以高麗藏爲主的刻本大藏經中所能見到的異體字的整理出版也在穩步進行。本書也正是在把握了以上所述研究動向之後所進行的研究。

本書的研究對象皆爲單經音義。除一部之外,其餘皆爲根據寫本所傳承下來的資料。而且特別要指出的是其中有幾部是8世紀奈良時代非常古老的寫本,並不僅限於音義書。近年來日本古寫本資料在保存古老原典的意義上,其

價值愈發得到高度評價。然而，這些音義書在作為漢字字體的研究資料上，其所具有的價值很難說得到了充分的認識。真要說的話，應該是被忽視了。本書對上述各種資料進行了詳盡的比較研究，對包括則天文字在內的漢字俗字、誤字、異體字等方面，不時提出了新的見解。本書在闡明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在漢字學史中所佔地位這一點上，做出了很大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

梁曉虹教授 1993 年來到日本，二十多年以來，始終如一地從事於運用佛教典籍來研究漢語史，並已有相關多部著作出版。這部新著將焦點集中於漢字字體問題，並對其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然俗字研究乃至漢字字體變遷史研究與古寫本研究相輔相成，這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能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領域。本書無疑將成為這些研究的基礎文獻。

在記憶當中，大約十年前，在東京的一次演講會上，我初次與梁教授相識。在日本做這樣研究的中國學者較少，這讓我印象頗深。實際上，其夫君高島謙一先生是旅居加拿大的中國學學者，是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1980 年在巴黎與高島先生相識以來，不時得其饋贈大作，他一直是我尊敬的前輩學者之一。因此，比起夫人梁教授來，我與高島先生當然知交更久。今年 3 月份，夫婦倆來訪京都時，我有幸與高島先生久別重逢。席間，梁教授托我給這本新著寫序。我欣然應允，並祝賢伉儷身體健康，學術上更加活躍。

2014 年 8 月 25 日

於京都陣南書室

序

徐時儀

佛門講緣，人生亦由因緣而有了很多佳話。

1996年8月我赴京參加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年會，會上與曉虹博士談起佛經音義的研究，彼此都意識到佛經語言研究在訓詁學和近代漢語研究上的重要價值。一晃數年，2002年我赴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參加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此時曉虹博士已定居名古屋，閑侃中，我提及石山寺所藏《玄應音義》寫於承安四年到安元元年間（1174—1175），其中第十二卷現藏於名古屋博物館。我在國內看的是影印件，有些字印得不是很清晰，很想趁便去名古屋博物館看一下原物。由此感歎日本傳存的寫經與敦煌寫經正好互補，成為海外記載與中國記述相印證的第三重證據和研究寫本藏經與刻本藏經淵源的珍貴資料^①，而曉虹博士身在東瀛，竟未能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攷察日本所藏寫卷，做一些國內學人不便做的比較研究。曉虹博士可謂有心人，且善解人意，自此以後果然開始關注日本寫本佛經音義，成果疊出，撰寫了《日本現存佛經音義及其史料價值》《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與〈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之詞彙比較研究》《〈四分律音義〉俗字拾碎》等論文。

2006年2月我應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落合俊典教授惠邀，赴日在佛教古寫經研究的學術意義——奈良平安寫經與敦煌寫經盛會上作《玄應一切經音義的流傳與版本攷探》的公開講演。曉虹博士聞訊專程從名古屋來到東京參會。會後欣承落合俊典教授盛情安排，我們有幸與落合俊典先生一同前往金剛寺目睹攷察了金剛寺所藏《玄應音義》寫卷。在金剛寺，我不禁又一次感歎日本所藏寫經的豐富，曉虹博士亦深有同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曉虹博士將研討日本寫本佛經音義所撰論文結集成《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

^① 10世紀末，日僧裔然（938—1016）曾入宋，並於北宋雍熙元年（984）將《開寶藏》帶回日本，其後日本的中尊寺寫經等不少寫經均以該《開寶藏》為底本。

心》，已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迄今，曉虹博士以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研究佛教與漢語史更是一發不可收，尤其在佛經音義俗字的研究方面鍥而不捨，用力甚勤，收穫甚豐。數年中又就奈良末期寫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鎌倉初期寫本《孔雀經單字》、大治本和金剛寺本《新華嚴經音義》、石山寺本《大般若經音義》和《大般若經字抄》、宮內廳書陵部所藏一卷本《四分律音義》、仲算所撰《妙法蓮華經釋文》醍醐寺藏本、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心空的《法華經音訓》和珠光的《淨土三部經音義》進行不懈的探討，以這些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為資料，撰成又一部新作《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從漢字的角度展開論述，分十章攷察漢字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對漢字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大與深入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誠為可喜可賀。

天道酬勤，功夫不負有心人。多年來曉虹博士黃卷青燈，傾心力於佛教與漢語的研究，尤令人感佩。品讀此書，從中可以觸摸到曉虹博士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學術高峰攀登的辛勞甘苦，感覺到一個有志於佛教與漢語史研究的學者志向的高遠和腳踏實地辛勤耕耘的難能可貴。

世間難得是純情，人生難得是善緣。承曉虹博士囑托，且自感十多年來彼此所結緣份之難得，卻之反為不恭，是以忝為序，並期待著曉虹博士在佛教與漢語研究這一領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續有新著問世。

目 錄

序(高田時雄)	1
序(徐時儀)	3
緒 論	1
第一節 關於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	1
第二節 日本佛經音義的研究價值及其研究概況	20
第一章 石山寺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漢字研究篇	40
第一節 關於信行所撰《大般若經音義》	40
第二節 石山寺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俗字研究	48
第三節 從《大般若經音義》俗字攷察石山寺本文本與寫經用字概貌	118
附 錄	126
第二章 《四分律音義》漢字研究篇	127
第一節 關於《四分律音義》	127
第二節 《四分律音義》漢字研究	133
附 錄	179
第三章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漢字研究篇	183
第一節 關於《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	183
第二節 《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漢字研究	194
附 錄	219

第四章 《新華嚴經音義》(大治本、金剛寺本)與《私記》漢字比較研究篇	222
第一節 關於《新華嚴經音義》	222
第二節 《新音義》(大治本、金剛寺本)與漢字研究之概覽	229
第三節 《新音義》(大治本、金剛寺本)與《私記》俗字比較研究	242
附 錄	273
第五章 《法華經釋文》漢字研究篇	275
第一節 日本《法華經》音義簡述	275
第二節 關於《法華經釋文》	279
第三節 《釋文》漢字訓詁研究之一	283
第四節 仲算漢字訓詁研究之二	307
附 錄	322
第六章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漢字研究篇	324
第一節 關於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	324
第二節 無窮會本《大般若經音義》與異體字研究	333
附 錄	363
第七章 《法華經音訓》漢字研究篇	365
第一節 關於《法華經音訓》	365
第二節 《法華經音訓》異體字研究	369
附 錄	381
第八章 《淨土三部經音義》漢字研究篇	383
第一節 關於日本篇立音義	383
第二節 從篇立音義篇目編次攷察日本中世漢字使用實貌	391
第三節 從篇立音義內容攷察日本中世漢字使用實貌	402
附 錄	420

第九章 《孔雀經單字》漢字研究篇	425
第一節 關於《孔雀經單字》	425
第二節 《孔雀經單字》字形疏證篇	427
附 錄	460
第十章 《大般若經字抄》漢字研究篇	462
第一節 從和風化轉向日式佛經音義的《大般若經字抄》	462
第二節 《大般若經字抄》與漢字研究	466
附 錄	486
後 記	487
主要參考文獻	491
一、著作與典籍	491
二、論 文	497
主要字、詞、語索引	507

緒 論

第一節 關於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

一、關於日本古寫本佛經資料

所謂日本古寫經，主要指起自奈良朝，經平安時代，至鎌倉時期，即刊本大藏經以前在日本書寫或者轉寫的佛經資料。在漢譯佛典的故鄉——中國大陸，除了上個世紀初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古寫經資料以外，人們已經很少能見到刊本大藏經以前寫本佛經的模樣了。而豐富的日本古寫經資料的不斷重現，卻讓人們驚喜地發現又有了再見一切經的古型或者說原型的機會。故學界對其之矚目，不亞於當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寫本文獻的發現。

日本寫經的歷史隨著佛教的東傳而展開。日本正史上有天武天皇元年（673）於飛鳥之川原宮召集僧尼書寫一切經的記錄。而被視為國寶、由小川氏所藏的《金剛場陀羅尼經》就被確認為乃天武天皇十四年（686）所寫。故而，日本古寫經早在奈良朝以前就已經開始。而進入奈良朝後，因為國家採取保護佛教以及獎勵信仰的政策，故寫經事業遂成為由國費贊助的大規模官方組織行動。另一方面，民間諸士也重視寫經功德，多書寫供養。寫經之業因此頗為隆盛，一切經等大部之作，屢屢被書寫傳抄。加之奈良屬盆地之區域，氣候適宜，風土優渥，所遭兵荒馬亂之災厄亦少，故一大批寫經資料經約一千三百年之漫長歲月，仍在各大寺名剎得以幸運保存。現存奈良古寫經就達千餘卷之多。平安時代，寫經之業仍興盛不衰。儘管沒有像奈良朝般的官立寫經場所，寫經大都出自僧侶以及知識階層之手，但伴隨著草假名^①的發明和發達，書法學習之風興盛，書法家頻出，故出自當時名家之手的寫經作品亦為數不少，其遺品亦尚有若干殘存。儘管平安中期以降，因為宋版一切經的輸入，諸寺院從實用的角度明顯傾向於版經，但因各宗各派信仰興盛，信者增多，故書寫供養一切經之風仍延綿不絕。特別是那些已成為一般信仰對象的特定經典，更是多次反復被抄寫

^① 把漢字的草書體進一步簡化，起和假名同樣作用的文字。

供養，其中尤以法華信仰和淨土思想影響下的寫經數量為最多。鎌倉以及南北朝時代，因為宋元版一切經的不斷輸入^①，相對來說，發願書寫一切經之現象比以前有所減少。特別是伴隨著春日版^②、高野版^③等地版經開版之興起，寫經之勢漸衰。然即使如此，因為信仰而發願抄寫供養各部宗經，如《大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淨土經》之風仍興盛不衰。平安、鎌倉兩朝的寫經相加則更是多達數万卷。從鎌倉末期至南北朝，禪宗發展興盛。五山^④各大禪院乃至一些地方禪寺也盛行開版刻印禪籍之風。特別是南北朝之時，五山版^⑤禪籍的開版臻於極盛。而自南北朝起，禪僧多攜禪籍返日，而攜帶元版、明版一切經歸來之現象則相對減少。更加以進入室町時期後，日本各地版經開版事業愈趨隆盛，古寫經供養一般都要在某些特別的場合纔會出現^⑥。相反，人們更多地或熱心於對一切經（宋元版或者古寫本）進行補筆，或對《大般若經》的缺卷加以補配等的書寫。但是，即使在此時期，寫經供養之風仍有延綿，其中尤以天皇為祈請蒼生之安穩，公卿學識之士為供養而執筆所寫之經典為多，主要如《大般若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等。

雖然有相當數量的古寫本佛經在歷史的長河中，因多次戰亂，以及各種天災人禍，或有亡失，或有損毀，但還是有不少資料得以流傳下來。它們或被保存於奈良、京都等地的名刹大寺，或收藏於貴族大家、博物院、圖書館等。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如正倉院聖語藏、石山寺一切經、七寺一切經、西方寺一切經、松尾

① 平安中期以後，進入中土留學的僧人回國時紛紛帶回宋版一切經。進入鎌倉時代，以後乘坊重源為中心，一人攜兩部以上經典回國，故宋元版的大藏經之數增加了不少。見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概說》中之《古寫經概說》。

② 指平安時代後期至鎌倉時代，在藤原氏的氏寺（平安時代，氏族首領為祈禱一族冥福與現世利益而建之寺廟）興福寺所刻木版佛教經典，亦為於奈良諸寺開版所刻佛教書類之總稱。“春日版”一名出現於明治時代，因鎌倉時代初期藤原氏的氏神被供奉於春日神社。

③ 指日本中世至近世，在紀伊高野山的金剛峯寺及其分支流派寺院所刊刻的佛教典籍，也特指鎌倉以降密教（主要為真言宗）一派以特定版型刊刻之書籍。

④ 自13世紀後半至16世紀之三百餘年間，日本禪宗吸收南宋五山、十刹之禪寺區劃分佈形式，於京都、鎌倉選出五所寺院規定為最高位寺院，稱“五山”，並於其下再置十所禪院，稱“十刹”。而當時五山派的僧侶（也包括京都、鎌倉兩處五山十刹及其影響下一切官寺中的禪僧）大多積極致力於詩文創作與研究，從而形成一代文學思潮，開創了日本歷史上著名的“五山文學”。

⑤ 即指以京都、鎌倉兩五山為中心，臨濟宗禪僧於鎌倉時代末（14世紀前期）至室町時代末（16世紀後半）開版刊刻的佛教典籍以及宋元刊本的復刻。

⑥ 以上參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概說》中之《古寫經概說》。

社一切經、興聖寺一切經、金剛寺一切經等。數量龐大，令人驚歎。由此，日本甚至產生了“寫本一切經”之名稱，指手寫的一切經，作為與“刻本一切經、印本一切經”並立的術語^①。而且“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亦已為學界共矚，尤其是早期古寫經。落合俊典指出：日本奈良平安寫經與高麗版、宋版等相較，更接近隋唐佛教文獻^②。儘管平安時期寫經中有一部分是以北宋官版《開寶藏》為底本轉抄的^③，但以書法端麗嚴謹、雕刻精良著稱的《開寶藏》在中國亦僅存數卷，而通過部分平安寫經後人尚得以窺其一斑，其價值亦自不待言。

基於此點，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豐富的日本古寫經與大量的敦煌遺書一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當年伴隨著聲聲駝鈴緩緩走向敦煌的佛教文獻賴以石室石窟的特殊環境得以保存的話，那麼由大批熱誠的中日僧人攜往東瀛的漢文佛經則因傳播者的虔敬真誠得以保留和傳佈。故而“古西域”的敦煌遺書和“古東瀛”的古寫佛經，同樣意義深遠，價值非凡。而且，日本古寫經從數量上看還多於敦煌佛典。落合俊典指出：被假定認為是奈良寫經轉寫本的平安寫經、鎌倉寫經合計共有三萬一千餘卷，即使除去約 10% 的蟲蛀缺損等部分，也還有一萬八千卷。此絕非小數，實堪稱卷帙龐大。人們仍可從附近的古刹和博物館中見到與敦煌佛典極為相似的日本古寫經。從被黃檗^④濡筆過的經卷文字，可瞬間聞覺從古絲綢之路所傳來的佛典之香^⑤。

二、關於日本古寫本中佛經音義資料

佛教自遙遠的西天印度來到中國，在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以後，又再度東漸，從而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諸國，而漢文佛典自然也隨佛教東傳而被輸入以上國家和地區，並由此形成了以漢文大藏經為中心的漢字佛教文化圈。特別是在日本，歷史上漢字不僅曾為其通用的權威性文字，即使日本文字產生以後，漢字也仍在其書寫交際工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加之，長期以

① 參落合俊典、方廣鋁《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

② 落合俊典《敦煌の佛典と奈良平安寫經—分類學的攷察—》第 239 頁。

③ 10 世紀末，日本僧人裔然（938—1016）曾入宋，並於北宋雍熙元年（984）將刻本一切經（北宋官版《開寶藏》）帶回日本，其後日本的中尊寺寫經等不少寫經均以該《開寶藏》為底本。

④ 1661 年，東渡日本的著名禪僧隱元法師（1592—1673）在日本皇室和佛教界的支持下，於京都宇治醍醐山麓按中國福清萬福寺規模式樣建造黃檗山萬福寺。1669 年鐵眼禪師於該寺寶藏院建藏版印刷所，發願開版印行一切經，現“鐵眼一切經”版本全部得以保存。此處以“黃檗”喻指日本古寫經。

⑤ 落合俊典《敦煌の佛典と奈良平安寫經—分類學的攷察—》。

來佛教文化的滲透,日本一直是漢字佛教文化圈內漢文大藏經書寫、刊刻、收藏的重要基地。以上我們對於日本古寫經的簡述,實際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數量龐大、內容浩繁的古寫經資料中,有一部分就是古寫本佛經音義。

佛經音義,作為中國佛教纂集中專門解釋佛經中字詞音義的訓詁學著作,具有直接佐助學人閱讀佛典的作用^①,自然也曾隨漢文佛典一併“輸出”,且因其辨音釋義的特殊性而成為中華佛教文化東傳的重要媒介。故而,佛經音義在海外也曾被大批書寫、刊印,也曾廣泛流傳。而這也成為近年佛經音義研究中的重要內容。

就像佛教在朝鮮、日本等國經過發展又形成另具特色的朝鮮佛教和日本佛教一樣,佛經音義作為治經的工具,要適應佛教在當時當地發展的趨勢,為僧侶信眾解讀佛書之用,就會與當地的語言文字發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佛經音義也必定會有新的發展,這也就為佛經音義研究提出了新課題。

本書研究對象為日本古寫本單經音義,這正是中國傳統佛經音義東傳後,在佛教興盛廣傳之時代背景下,日本學僧應廣大信眾研讀佛典之需而編撰的。本書主要圍繞古寫本單經音義與漢字研究而展開,這也是近年來佛經音義研究的新課題之一。

為使讀者對我們的研究對象有較為全面的瞭解,我們有必要在此對日本佛經音義資料加以爬梳整理。

日本佛經音義之內容非常豐富。水谷真成在其《佛典音義書目》^②中共列出十二大部,二百三十四種^③。而根據其說明,在其所列舉的音義書目中,實際上還並不包括內容無法判明者,而且也沒有收錄類似《龍龕手鑑》《類聚名義抄》等一般佛教辭書和字書,而有關悉曇和聲明之類,亦只收錄了少數可稱之為“音義”者。因為是“存佚”共記,當然有很多實際是僅有書名,並無原物。但即使這樣,也至少可以證明在日本歷史上它們曾經存在並流傳過。僅從此書目,我們亦可瞭解到有眾多古佛經音義曾從漢土傳到東瀛,並得以廣泛流傳,而日本僧人又在此基礎上編撰了不少為己所用的新佛經音義之史實。

日本現存佛經音義數量不少,內容也較為豐富,可從不同方面進行分類。

① 參陳士強《佛典精解》五《纂集部·總敘》。

② 《中國語史研究》第12—41頁。

③ 有的一種實際包括多個版本。如“第一,衆經部”之第四種,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就有麗藏、宋藏、金藏、元藏、明藏、槩藏、縮藏、汜藏等。而“第二,華嚴部”第四十九種,慧苑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入藏的則有麗藏、宋藏、元藏、明藏、槩藏、縮藏等。

我們主要從來源上進行歸納整理^①，認為主要可分為以下兩大類型：

（一）隨佛教東傳而輸入的中國傳統佛經音義

隨佛教東傳而來到東瀛的中國僧人所撰述的各種佛經音義，在當時漢文通行的日本，作為中華佛教文化東傳的重要媒介，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岡田希雄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就指出：音義類書雖多少受其性質的限制，不如一般字書或韻書使用方便，但從某某音義是基於某部經的註疏書這一點來說，又要比一般字書韻書更為方便，所以隨漢學東傳而進入日本的音義類數量很多^②。這些佛經音義曾屢被抄寫，廣為流傳。而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後來還被刻寫刊印，其中有不少為各大寺廟及貴族大家所收藏，從而留下了各種不同的寫本和版本，成為日本現存佛經音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被公認現存最早的玄應所撰《大唐衆經音義》，到遼代希麟和尚的《續一切經音義》；從佛教興起的奈良朝，到幕府掌權的室町、江戶時代，可以說，中國僧人所撰述的佛經音義差不多都傳到了日本，不僅得以抄寫刊印，收藏保存，而且作為古代學問的代表，深受推崇，影響很大。如：

被認為現存最早的唐僧釋玄應的《大唐衆經音義》^③，奈良時代以來就多被抄寫，後廣為刊印，收入不同的漢文大藏經^④。水谷眞成《佛典音義書目》收錄有相關書目共十三種，其中有些古寫本至今尚有殘卷可見。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藏古文書《正倉院文書》中多處有關於奈良時代人們屢屢書寫、讀誦、鑽研《玄應音義》的記載。而現在正倉院聖語藏所收錄的卷六之殘簡為天平年間（729—749）寫本^⑤。而平安時代，諸寺亦多書寫收藏，如收於《古辭書音義集成》第七、第八、第九卷的主要就是以平安時代《玄應音義》古寫本——法隆寺一切經的大治三年（1128）書寫本、石山寺一切經的安元年間（1175—1177）書寫本為中心而組成^⑥。正倉院聖語藏還收有寫於平安朝時期的《玄應音義》的卷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共七卷。而根據寫於建長二年（1250）的《高山

① 下綫為筆者所加。

② 岡田希雄《至德三年版心空〈法華經音訓〉解說》。

③ 以下簡稱《玄應音義》。

④ 黃槩版的鐵眼一切經、天海僧正本活字版一切經以及明治年間完成的縮刷藏經、卅字藏經等。

⑤ 參小林芳規《一切經音義解題》。

⑥ 昭和七年（1932）山田孝雄就曾經匯集聖語藏和大治寫本一起編印，而以大治本為主，所缺各卷則以高麗藏本補足。

寺聖教目錄》，可知進入鎌倉時代，《玄應音義》的抄寫仍在繼續，而現存於天理圖書館的卷十八為鎌倉後期寫本^①。隨著研究的深入，新的成果又有呈現。以落合俊典為中心的研究團隊在經過了長期調研攷察之後，於2006年3月正式複製刊印出版了以名古屋七寺本、大阪河內金剛寺本為主，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石山寺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所藏七寺本、西方寺本等關於《玄應音義》的寫本資料^②。這是日本學界在已有《玄應音義》古寫本整理的基礎上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些寫本資料因為相對後世刊本藏經，與敦煌、吐魯番寫本一樣，更多地保存了《玄應音義》唐代寫本的原貌，據此可以訂正後世刊本藏經中的錯誤。特別是這些寫本資料又多幾乎是全卷，不似敦煌寫本多為斷片，故其價值極為重大^③。另外，從日本人所編撰的古辭書，如《篆隸万象名義》《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等古字書、詞書中也可見《玄應音義》屢被引用，頻為出典，更可證明《玄應音義》在日本歷史上廣泛地流傳過。又如：

唐代慧苑曾專為八十卷本《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撰著音義二卷^④。據《大日本古文書》七卷以及《奈良朝現在一切經疏目錄》等文獻記載，日本天平十一年(739)就有《慧苑音義》之流佈。而天平十一年(739)距慧苑撰述此書的唐開元十年(722)僅隔17年^⑤。可見《慧苑音義》寫出不久即被傳入日本。而隨著日本天平勝寶年間(749—757)，“南都六宗”^⑥之一的東大寺華嚴宗的成立，《華嚴經》作為華嚴宗所依據之宗經，自然頗受重視。而且又因當時東大寺華嚴教學頗為隆盛，故不但《華嚴經》得以廣傳，與《華嚴經》有密切關係的各種書寫和解讀之風自也興起，故慧苑為《新譯華嚴經》中難懂或難讀之字、詞進行辨音釋義的《慧苑音義》廣為流佈。如收入水谷真成《佛典音義書目·華嚴部》中各種

① 參小林芳規《一切經音義解題》。

② 《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第一輯。

③ 參高田時雄《玄應音義について》，《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第一輯第7頁。

④ 以下簡稱《慧苑音義》。

⑤ 因《慧苑音義》未署撰時，故其成書之年學界尚無確切之說。陳士強在其《佛典精解》第1008頁指出：約在武則天神功元年(697)至睿宗太極元年(712)之間；苗昱在其博士論文《〈華嚴音義〉研究》第9頁認為慧苑當在其師法藏過世(712)之後始撰此書，因最早記錄該書的《開元釋教錄》的作者智昇於開元十八年(730)將其所撰進獻朝廷，故《慧苑音義》當完書於730年之前；日本學者(小林芳規等)則認為《慧苑音義》之撰述時間應為唐開元十年(日本養老六年，722)之際。本文用日本學者之說。

⑥ 亦稱“奈良六宗”，指創立於日本奈良時代的六個佛教宗派：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

版本的《慧苑音義》多達十一種，有的雖“撰者不記”，但內容卻為《慧苑音義》；有的撰者名為“慧遠”，實乃“慧苑”之誤；還有如《新譯華嚴音義》二卷，雖撰者不詳，寫年不確，但內容亦實為《慧苑音義》，而且在《奈良朝現在一切經疏目錄》第1875有記載，蓋亦為奈良朝寫本。小林芳規還指出：石山寺舊藏《新譯華嚴經音義》卷上有安元元年（1175）寫本，卷下有應保二年（1162）寫本。二本皆屬平安後期寫本，儘管多有訛誤，但卻能由此推定其底本之狀貌^①。而且，通過此二本，我們也可瞭解從以學習吸收唐朝佛教文化為特徵的天平文化^②最盛時期至日本佛教已邁向“成熟期”^③的平安時代《慧苑音義》在日本盛傳之歷史面貌。

不僅如此，甚至還有一些古佛經音義，在中國本土已經散佚不存，但在日本卻或有殘存抄本，或因被引用而保留在其他古籍中。如：

《續高僧傳》卷三十《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附《智騫傳》有記載：

時慧日（道場）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指漢字的通體和俗體），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祕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咨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跡，變體詰訓，明若面焉^④。每曰：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敘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

可惜的是，這麼一本在當時頗受僧俗歡迎的音義書，卻未能流傳下來。後人只能根據這點記錄瞭解此書的價值，其體式則無從知曉。而高田時雄攷證《法華經釋文》卷下引有一條疑為智騫《衆經音》的佚文。《法華經釋文》釋《法華經》卷七《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手腳繚戾”之“繚”字時有“騫師云：宜為了字，謂子無兩臂，不任統於事務，家業畢了，無所付委也”之引文^⑤。如果此確為智騫之言，那麼可以此而窺其《衆經音》之一斑。又如：

被認為在玄應之前，隋朝東都洛陽慧日道場的沙門曇捷曾為解讀《妙法蓮華經》而撰述《法華經字釋》，但原書在中國本土卻早佚不傳。日本僧人仲算的《妙法蓮華經釋文》將此書作為兩大重要基柱之一，故此書的一部分內容以被引用的形式保留在仲算書中。丁鋒《殘存最早佛經音義攷——隋釋曇捷及其所著

① 小林芳規《小川廣巳氏藏〈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解題》。

② 奈良時代的文化，於聖武天皇的天平年間（729—749）達到最高峰，故稱。

③ 梁曉虹《日本禪》第27頁。

④ 此語是指智騫對於寫法跟當日不同的古時候變體文字能一眼辨認出來，一若他曾在古時候生活過，曾面對流行這種寫法的時代。

⑤ 參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と行瑠〈隨函音疏〉》。